

大家
系列

鲁迅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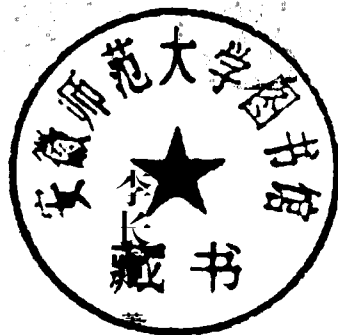
李长之
印

李长之 著

李长之，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
与季羨林、吴组缃、林庚并称为「清华四剑客」。
《鲁迅批判》为「鲁迅学」的第一本经典。

天津人民出版社

魯迅批判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批判 / 李长之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1

(隐藏的大家系列)

ISBN 978 - 7 - 201 - 06218 - 1

I. 鲁… II. 李… III. ①鲁迅(1881~1936)——人物研
究②鲁迅著作——文学研究 IV. K825.6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232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序

批评家李长之对鲁迅的研究

于天池 李书

长之先生一生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但从未有作品如他对鲁迅的批评那样震撼过批评界,以至毁誉交加,影响到他的生活际遇。《鲁迅批判》曾使得未满25岁的他在文坛上一举奠定了批评家的地位,同时也给他日后带来了终身的麻烦、屈辱和灾难!日本侵华不久,日本人的禁书目录上就赫然列有此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光明日报》上刊载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后不久,李蕤的打棍子的文章也随即见报——其实这是1949年后第一次“文艺批判”的开始,只是浅尝辄止罢了。“文革”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工宣队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家出版社找到长之先生,表示愿意重出《鲁迅批判》,但前提是把《鲁迅批判》改为《鲁迅分析》。长之先生拒绝了,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

一、鲁迅研究的发轫与前奏

长之先生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鲁迅批判》之前,即1935年之前是第一个阶段。

1929年2月14日,长之先生写《读鲁迅在广东》,谈鲁迅对青年的鞭策;1931年6月23日,写《〈阿Q正传〉之新评价》,认为鲁迅的贡献是抓住了中国国民的本质;1932年9月29日,写《评〈三闲集〉》、《评〈二心集〉》,强调鲁迅的技巧是属于抒情一类;1933年5月4日作《评〈两地书〉》,推断鲁迅之铸造于传统和环境的个性;10月26日作《评〈伪自由书〉》,“论述不只是鲁迅,乃至所有杂感文的作者的贡献的得失”(《鲁迅

批判》后记)。这一组论文是长之先生对鲁迅研究的发轫之作,涌动着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中的青年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其中虽不乏思想的闪光,像《〈阿Q正传〉之新评价》,指出“《阿Q正传》的真正价值,但与其说是在它的文学技巧一方面,则远不如说在它的内容。它是一个忠实的我国国民性的写照”;他在评述《鲁迅和景宋的通信集——两地书》时说:“我个人以为鲁迅在文学上顶不可及的,是他的抒情散文”,等等。但终嫌零碎、分散,是杂感式的,甚至带有青年所特有的幼稚和成长阶段的伤感目光。像他在评《三闲集》时就特别强调他在鲁迅的杂文中“更爱鲁迅抒情的笔调,特别是写寂寞之感”,然后便大段引用鲁迅的《三闲集》中《怎么写》的“微妙的思绪”,其实那是年轻的长之先生从自己的心态去欣赏和理解鲁迅的。那时长之先生尽管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但只能称是业余,因为直到1933年的春天,他仍在清华的生物系攻读生物专业,《〈阿Q正传〉之新评价》还是在清华生物馆无脊椎动物实验室草就的呢。因此,这一时期长之先生对鲁迅的批评,可看作是后来他写《鲁迅批判》的准备和序曲而已。

二、青年批评家心中真实的鲁迅——《鲁迅批判》

《鲁迅批判》草创时的一系列论文的发表及其出版是长之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的长之先生正式开始其文学批评生涯。从1933年秋天开始,他先后在《现代》上发表《我对于文学批评的要求和主张》、《论中国目前批评界的浅妄》、《批评家为什么要批评》。这些文章不啻是长之先生进入文学批评界的宣言。如果说长之先生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喜欢德文、喜欢歌德的话,那么,在他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后,受杨丙辰教授影响,则进一步接触了康德哲学,并更进一步接受了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温克耳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等德国文艺理论的影响,乃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长之先生此时对于自己早期印象式的、杂感式的乃至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批评文字进行了反思,认为“批评的文章也得是文章”,应讲究艺术性;同时他在读宏保耳特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一文后,认为对一个作家的批评应“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写出他的进展过程”。长之先生的批评文字此时较

前有了很大的改进,有了新的探索。《鲁迅批判》恰恰是长之先生对自身批评文字反思后的一种成功的试验,^①并成为日后他批评文字的风格和特质的起点。这一时期李长之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批评,主要包括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鲁迅文艺中表现的人生观》及发表在他此时主编的天津《益世报》的《热风以前之鲁迅》、《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等,后来其中大部分文章由于赵景深先生的帮助,结集成《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出版。

《鲁迅批判》只是长之先生在1935年前后关于鲁迅评论的一个主要部分。在结集时,长之先生出于对全书结构上完整的考虑,删掉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鲁迅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删掉《热风以前之鲁迅》,认为“它是与次篇相连,单独没有什么意义”;删掉《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认为“它不全,而且究竟是鲁迅的‘身外之物’”。^②应该说加上删去的这些部分,才是长之先生这一时期对于鲁迅的研究的全部,才更全面地反映了长之先生那时对于鲁迅的理解和评论。

站在我们现时对鲁迅资料的占有和研究的立场上,长之先生在1935年出版的《鲁迅批判》显然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显得清浅和不足,有些方面甚至不够准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他把诗人和思想家分开,而对诗人又拘泥于一种类型并应用于鲁迅身上,他说:“诗人是情绪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被动的,在不知不觉之中,反映时代的呼声的,而鲁迅是的;诗人是感官的、印象的、把握具体事物的,而鲁迅更是的。”并进而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邃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进发他当前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他缺少一种组织能力”。“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鲁迅批判》P166)这些观点都颇值得商榷并成为日后人们认为他攻击鲁迅的佐证。作为专著,《鲁迅批判》在结构上显得不够十分缜

① 依据长之先生在《鲁迅批判》“后记”当中的回忆,他的批评文字在技巧上的新尝试是批评老舍的《离婚》(1933年11月3日作,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期)。在方法上“注意本质的进展”的尝试,则首先是批评茅盾的文章,即1934年3月15日草完的《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此文因与《文学季刊》的矛盾没能发表后稿件亦丢失。

② 见《鲁迅批判》“后记”。东方出版社,1943年7月版。

密,不仅其体例和单章字数受制于报纸的连载^①,而且其拟定的总题目先后数变,所写内容随意性也很大,最后干脆“我要停笔,因为我惦记着许多别的文章和书”,“以后有机会,我也许在增订本时,恢复本来所要完成的规模的吧。”(《后记》)另外,就本书当时采用的批评方法而言,显而易见是深受德国作家宏保耳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的影响,这影响若用“移植”或许更准确些。宏保耳特在批评席勒所用的精神进展的阶段与人格、环境之联系的种种方法被长之先生当成分析鲁迅的利器在借用着,甚至宏保耳特在表述天才时之神秘并引歌德为证时,也被长之先生用以说明鲁迅之出现,等等。

但是,《鲁迅批判》在鲁迅研究史上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是我国有着对鲁迅先生的生活和思想作全面考察的企图的第一部草创的书。在它之前,虽然批评界里已有像瞿秋白、胡适、赵景深、钱杏邨等人,尤其是瞿秋白对鲁迅的精彩论述,但他们都是从鲁迅的某一篇,某一类作品,或鲁迅思想艺术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的论述,而缺欠全面综合的分析。在当时那个时代,“像本书这样有组织,有体系,字数在八万以上的巨制,已是文坛上一个最勇敢而最有意义的创举”(引自《青年界》登载上海北新书局广告)。而且,这种有组织、有体系的批评,在中国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其意义甚至超越了对鲁迅分析批评的自身,因为那时以一部有体系的专著对作家作品进行评论,不仅对鲁迅,即对于整个文坛而言,也实在是罕见的事!

《鲁迅批判》对鲁迅的评论的确能见其大,见其发展,具有难得的史的眼光。在“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部分,长之先生将鲁迅精神的进展划分为六个阶段,“每一时刻,所在的环境都有一种非常的变更,他自己的生活上也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显然的影响”,并进而指出鲁迅前半的思想中心是进化论,后半的思想中心是阶级学说:

这是多大的转变!他一向信任的进化论,是认为不够了,必得有补充,这是什么呢?却就是他所谓:“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二心集》, P73)

^① 见《鲁迅批判》“后记”。“当时正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打算一次发表一段。有题目时,读者可以清晰些。分段也没有大道理,是看字数。总之,凡五六千字上下就予以为题,算是一段。”

.....

一九三〇年,他签名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曾去讲演。……在中国,自己敢于公开承认是左翼(《南腔北调集》P46),而又能坚持其立场的,恐怕很少很少。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的人格。

.....

他这时批评了梁实秋,批评了成仿吾,批评了钱杏邨,对于左翼,他有指示;对于右翼,他有了剖解;他从前只是为青年辩,现在他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辩了,但他却也并不忘记攻击他们的短处。在理论上,他为忠实的翻译辩,他为阶级状况存在辩。在从前,他有所攻击,是因为“关己”,现在是不触着自身,也来战斗了。从前他的战斗为个人,现在是为受压迫的大部分人了。

文章与内容相亲,他这时的作品也最是在浑浑厚厚之中,而有一种生气。所以我认为这是他最健康,而精神进展达到极点的时期。^①

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发展到阶级论者,这已是鲁迅研究中不争之定论。1933年,瞿秋白先生在其著名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第一个揭示了这一结论,那时正在清华读书将近毕业的长之先生,并没有看到瞿文^②。长之先生在1935年7月写的“鲁迅的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所得出的同一结论是独立得出来的,由于他的结论有着较细密的逻辑推理,一步一步求证出来,便更令一般人信服。我们不能说鲁迅研究史上这一结论肇始于长之先生,但起码可以说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是早期提出这一结论,普及这一结论,并使世人正确地认识鲁迅精神进展阶段的功臣之一。

对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认为:

① 见《鲁迅批判》“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东方出版社。1943年7月版。

② 见长之先生《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为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作》。“不用说,像瞿秋白同志对于鲁迅先生的具体帮助,像鲁迅先生对于苏区的军事胜利的电文的那样珍贵的材料,在我执笔时是没见到了。”《光明日报》“学园副刊”第六期 1950.10.20。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期间的人物中最煊赫的一个代表者，他呼吸着时代的气息，他大踏着步向前走，他象高尔基一样，他的遭遇是完成了他的……”

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勇猛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

“鲁迅文艺创作之出，意义是大而且多的，从此白话文的表现能力，得到一种信赖；从此反封建的奋战，得到一种号召；从此新文学史上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从此中国小说的变迁上开始了真正的短篇；章回体、“聊斋”体的结构是过去了，才子佳人，黑幕大观，仙侠鬼怪的内容是结束了，那种写实的，以代表了近年来农村崩溃，都市中生活之苦的写照，是有了端倪了；而且，那种真正的是中国地方色彩的忠实反映，真正的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巧妙运用，加之人类的不容易推却的寂寞的哀戚，以及对于弱者与被损伤者的热烈的抚慰和同情，还有对于伪善者愚妄者甚至人类共同缺陷的讥笑和攻击，这都在显示着是中国新文学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国际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①

假如我们了解此时的长之先生还不到25岁，尚在清华大学读书；了解到那时鲁迅的有些作品还没有印成册子，还没有《鲁迅全集》，作者的取材远不很完全；了解到当时批评界虽已有瞿秋白精湛深刻的评论，但仅限于针对杂文，而大多数批评尚是零篇断简，或囿于政治立场的判定，或从文体的某个方面加以批评，那么长之先生把鲁迅放在国际的文化环境之中，将鲁迅的所有文学创作融汇贯通并评估其在新文化运动中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中之作用和意义，就不能不惊叹其视野之开扩，目光之敏锐，是如何具有史识和史鉴，在当时的众多鲁迅批评论著中是如何先声夺人了。

尽管《鲁迅批判》深受德国古典美学批评，特别是宏保耳特论席勒一文的批评方法和理论的影响，有些方面甚至食而不化，但其注重鲁迅精神本质，注重其精神进展，注重作家人格与风格互相辉映阐发，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中去吟咏玩味，平等地是是，非其

^① 见《鲁迅批判》：“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东方出版社。1943年7月版。

非,并用一种抒情的、散文般的语调激扬评议,不仅在当时的鲁迅评论中,就是在整个半个多世纪的鲁迅批评史上都具有特立独行的味道。

《鲁迅批判》是研究鲁迅的论著中少有的经过了鲁迅过目的论著。长之先生在《鲁迅批判》的“三版题记”中说:“鲁迅先生是见过付印之前的稿样的,他很帮忙,曾经订正过其中的著作时日,并曾寄赠过一张近照。那种照片的大小是像明信片样的,从背面看,见出是自一张硬纸上揭下的,我曾让书局照原来的大小,印在书面上。”鲁迅在1935年7月27日给长之先生的信中,对《鲁迅批判》给予了热诚的鼓励,说:“我并不同意于先生的谦虚的拙议,因为我对于自己的传记以及批评之类,不大热心,而且回忆和商量起来,也觉得乏味。文章,是总不免有错误或偏见的,即使叫我自己做起对于自己的批评来,大约也不免有错误,何况经历全不相同的别人。但我以为这其实还比小心翼翼,再三改得稳当了的好。”^①这使长之先生异常感动,喟叹鲁迅先生“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猜忌刻薄,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反而是并不世故,忠厚而近于呆子的地步”。如果说在此之前鲁迅对长之先生还不十分了解的话^②,那么从此,54岁的鲁迅像对待其他文学青年一样,与年龄小于他30岁的长之先生成了文友。现收存于《鲁迅书信集》中鲁迅致长之先生的信有两封,但实际上起码有三封之多^③。而此后不到一年,鲁迅就逝世了。

三、在现实斗争中回望鲁迅

此后一个时期,由于鲁迅的逝世,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由于其批评兴趣的转移,长之先生对于鲁迅的研究有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

① 见《鲁迅书信集》下卷。

② 见《鲁迅书信集》下卷“李长之不相识,只看过他的几篇文章,我觉得他还应一面潜心研究一下;胆子大和胡说乱骂,是相似而实非的。”“看那《批判》的序文,都是空话,这篇文章也许不能启发我吧。”

③ 见《鲁迅批判》“三版题记”:“我曾把鲁迅给我的信的一张寄给书局,也想制版,所以目次上也有一条是‘鲁迅先生手迹’,结果手迹也不见了,又留下一个空头支票,原信也一并不见踪影了。”

从1936年到1947年,他几乎没有发表什么专门研究鲁迅的文章^①。但到了1948年,长之先生重新又开始了对于鲁迅的批评,像1948年10月19日他在师大鲁迅纪念会上做《鲁迅和我们》的讲演,10月20日在中法大学的纪念会上做《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的讲演。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长之先生研究鲁迅的第三个阶段。此一时期,长之先生对鲁迅的专论虽然不多,但较之《鲁迅批判》时期即第二个阶段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写《鲁迅批判》时的李长之还是一个刚踏入文学界的尚未毕业的大学生的话,那么,此时的长之先生已经是颇有业绩的学者、教师、文艺批评家了;如果说,当年写《鲁迅批判》时的长之先生是从校园青年的角度感悟式地批评五四文学的先驱鲁迅的话,那么此时经过实际生活的磨练的长之先生则从现实生活的斗争中体验到鲁迅的精神,鲁迅的思想之可贵;如果说,写《鲁迅批判》时的长之先生对鲁迅的批评主要依赖于德国古典美学和形式美学的话,那么此时的长之先生不仅对德国哲学和美学有了一番新的认识(见《梦雨集·论德国学者治学之得失与德国命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也开始有了了解^②。尤其是,由于此时长之先生亲眼目睹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残暴,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有了根本的转变,并参加了反抗国民党特务的暴行^③,因此,此一时期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有了另外一种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带有强烈的现实斗争色彩,爱憎分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的抗议,他说:“因为事实的暴露和演变,我们仿佛觉得鲁迅所说的话,都逐渐证实,或者逐渐兑现。”(《鲁迅和我们》,1948年10月19日在师大鲁迅纪念会上的讲演)“在这大票满天

①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此一时期中,长之先生研究现当代文化时又不断提到鲁迅,评论鲁迅。比如,他在《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中论到“五四运动在文化上是一个未得自然发育的民族主义运动”时,说“那时的鲁迅先生也便说读了西洋的书使人活,读了中国的书使人死”。他在《悼季鸾先生》中首肯张季鸾的观点,认为张季鸾“真爱鲁迅先生者也,然亦真能举鲁迅先生功过之实者也”。他评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认为“书虽小,可是使我们对于鲁迅的性格和状貌更清楚了。这就是本书的成功。”他对这一时期评论鲁迅的著作表示失望:“有些册子,都是采集别人的,有些册子,就似乎只像炒剩饭一样,只是一种排比鲁迅原文的工作。”(《鲁迅批判·三版题记》)这说明长之先生始终没有忘情并一直在关注着鲁迅的研究工作。

② 1948年3月,长之先生为了给学讲伦理学,去北平图书馆参考苏联哲学著作,其中《苏联伦理学》一章给他以很大启发,使他“放弃了自由主义幻想”,7月,长之先生“开始读马克思主义手册(A Hand Book of Marxism),一篇是《共产党宣言》。”(见《李长之自传》)

③ 如长之先生1948年6月写《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编后附注:“三十七年四月八日写起,十四日写毕于抗暴罢教中。埋头工作,祝福伤者!”(见《国文月刊》第68期)

飞,人民活不了的时候,还讲什么文学?还讲什么文学批评?文学,文学批评是首先要遭到批评的。我的结语是:大家也许要问,那么批评家不都应该是思想家了么?是的,批评家正应该是思想家,只是他还要更进步,这就是,要有一种战斗精神。从这个观点看,目前最伟大的批评家,也许只有像鲁迅、闻一多那样的人才配!”(1947年12月14日在北大的讲演《文学批评的课题》)长之先生这一时期对鲁迅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文艺批评这一课题进行的,这一切入点的选择本身就充满了一种现实的精神,而他尤其强调了鲁迅文艺批评的战斗性:认为鲁迅文艺批评的实践和本质是“有血色的批评,而不是苍白的形式主义”。他说:“批评家之所以为批评家,在他的批评精神,批评精神的核心是战斗,鲁迅先生够这个资格。”“他战斗,而是现实性的战斗。所以他最反对‘逸气’。”而这一切都与当时国民党倒行逆施,以致天怨人怒,引起知识分子普遍口诛而笔伐之的氛围密切相关。其次是,长之先生纠正了前一时期对鲁迅的某些认识。他在《鲁迅批判》中认为鲁迅“不够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一个思想家所应有的清晰以及理论上建设的能力”,“至于在思想上,他却止于是一个战士。”而在这—时期,他在《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中则明确肯定鲁迅是一个思想家,他说:“在去年,我曾在北大讲《文学批评的课题》时,说过:‘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配做批评家’,理由呢,因为批评家是一个战斗的思想家的缘故。可是当时只是这么一个感觉而已,最近因为要纪念鲁迅逝世十二周年,重新读读鲁迅先生的著作,才越觉得我那一句话是异常可以成立了。”从认为鲁迅“止于是一个战士”,到认为鲁迅是“一个战斗的思想家”,表明了长之先生对鲁迅认识的深化。再其次是,他逐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也就是鲁迅所指明的“以现实性和大众性为标准,以一个作者的出身、生活、风气、环境为分析的参考,而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来研究和批评鲁迅,并认为“批评的精神在战斗”,“现实性的战斗”。不能说长之先生此时对鲁迅的文艺思想的理解就一定十分深透了,但他的确抓住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质和要害,他之服膺和学习鲁迅,同时表明了他的文艺批评思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与写作《鲁迅批判》时单纯搬用温克尔曼和宏保耳特的理论和分析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最后是,长之先生在此之前对鲁迅的研究,偏重于鲁迅的精神性格分析,如说鲁迅在灵魂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往往失于主观臆断;偏重于文集和文体的研究,而难免流于割裂、零碎。此时他从文艺批评切入对鲁迅的研究,固然

有着现实斗争的刺激和需要的原因,但也表明他对鲁迅的研究进一步加浓了学术的气息,开始了对鲁迅学术思想方面的探讨,像他在中法大学的讲演《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启示》,就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对鲁迅研究新思路之先路。

四、学术视域中的鲁迅——《文学史家的鲁迅》

长之先生对鲁迅研究的第四个历史时期是自1949年到反右斗争。其起点是1950年10月在《光明日报》“学园”上的《“鲁迅批判”自我批判》,终点则是195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文学史家的鲁迅》,而论文则集中在1956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前后。

1950年,在鲁迅先生逝世十四周年之际,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长之先生发表了《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实际上,这篇文章发表的另一个背景是时值知识分子洗心革面的时候。在这篇“自我批判”的文章中,长之先生坦诚地回顾了《鲁迅批判》创作的背景,它的不足之处和值得肯定的地方,表达“对于本书,愿意重写”的愿望。长之先生披露的心迹是诚恳的、衷心的,因为自1947年下半年,他的思想和这本书中的思想已经有了显著的距离,已经感到《鲁迅批判》的“不完全”,“有些基本的病症可以指出”。^①但1950年11月《光明日报》学园第九期很快又发表了李蕤文章,题目是《保卫鲁迅》,对长之先生文章痛加批判,声称李文“是每一个爱护鲁迅先生的人所不能容忍的”,深文周纳地暗示《鲁迅批判》代表了“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看法。^②这大概是1949年以来在鲁迅研究上第一次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批判而以长之先生的《鲁迅批判》祭刀,其论述谋略和方法也颇开“文革”中大批判风气之先,从此《鲁迅批判》和长之先生也就真的被摆在了极左的大批判祭坛的位置。长之先生是很天真的,他立刻写了《关于保卫鲁迅先生——答李蕤先生》一文并在《光明日报》“学园”第十一期上发表,诚惶诚恐地“谢谢李蕤先生对于我那篇自我批判的指正,我得了一些益处,也得了一些启发,但也有不同意或不赞成的地方”,表示“是就是,错就错,不怕指出,不怕

① 长之先生《〈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见1950.10.20.《光明日报》。

② 李蕤:《保卫鲁迅先生——李长之的〈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读后》,见1950.10.24.《光明日报》。

讨论。不同的意见,尽管提出,越直接越好”。但讨论没有进行下去,双方都仅立此存照。从长之先生还可以答辩来看,当时的向党交心整风——尽管是研究鲁迅的学术问题——还是真诚而宽松的,起码长之先生自己的感觉是如此。

在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1956年前后,长之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研究鲁迅的论文,如《鲁迅对文艺批评的期待》(《光明日报》1956.10.13)、《鲁迅先生和杂文》(《北京文艺》1956.10)^①、《鲁迅和嵇康》(1956.11.17日写,后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6)、《鲁迅美学思想初探》(《前哨》1957.3)、《文学史家的鲁迅》(《人民文学》1956.11)。其中后两篇在选题和内容上,无论就长之先生个人的研究还是就当时鲁迅的总体研究上都有新的开拓。另外,他还为少年儿童写有《鲁迅》的通俗小册子。遗憾的是,这个小册子现只存有16页,近五千余字。不知当时就未完稿呢,抑或是“文革”中散失了。但仅从他所勾画的青少年时期的鲁迅的面影看,活泼、明晰、流畅、生动,一定会是一部很受青少年读者欢迎的通俗儿童读物。

长之先生的《鲁迅美学思想初探》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从美学的角度研究鲁迅的思想。长之先生认为鲁迅的“美的理想”,是“壮美”而非“优美”,是“战斗的美”而非柔和的美。他在论到属于“壮美”的现象就欣喜,就比较深入,而“论到属于优美的形象就比较少,也比较薄弱”。他对美的认识,有着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并有阶级斗争的现实内容,因此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奠了基”的。在美学的其他一些基本问题上,长之先生认为“鲁迅也曾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比如,在典型问题上,“鲁迅触及了真正艺术品的永久具有魅力的问题”,他认为“文艺的永久性乃是相对的”。在美感对象上,“鲁迅认为不是自然景物和人都可以构成美感对象,因此作为文艺素材也便有了差异。”“在文艺和阶级的关系上,鲁迅更是有着出色的说明并战迹的,他批判了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文艺思想的伪装,也批判了简单化的庸俗化倾向,在民族形式问题上,鲁迅也提出了‘删除’、‘增益’和‘变革’的道路”,等等。长之先生文章发表后,一些探讨鲁迅美学思想的文章接踵而至,开辟了鲁迅研究的

① 据《作者附记》,本文只是长之先生写的“《鲁迅的文艺批评》”一文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是:《鲁迅对文艺批评的重视》、《鲁迅论批评的积极作用》、《鲁迅对当时中国文艺批评的批评——浅和狭》,最后也就是第五部分:鲁迅在文艺批评工作上的实践。”可惜前三部分没有发表且已散失,我们无缘见到了。

一片新的土地。

长之先生《文学史家的鲁迅》是煌煌近两万余言的长文,系统地评价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丰硕的成绩。他论鲁迅文学史著作之历史地位,说“我们有理由说鲁迅乃是科学的中国文学史的奠基人”;论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中国特色,说鲁迅“所使用的方法的确是运用了中国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的,这是鲁迅文学史著作的一个特色”;论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体现的文学发展规律性,论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解决的文学史方法论,认为“尽管鲁迅的文学史著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尽管鲁迅的文学史著作还没有达到完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美学原则的地步,然而就他所遗留的一部分文学史著作论,已经解决了文学史方法论上的许多根本问题,已经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若干轮廓,已经树立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范例,已经开辟了科学地处理中国文学史的道路”。

从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角度评价鲁迅的成就并不始于长之先生,比如1949年10月郑振铎就写了《中国小说史家的鲁迅》一文,对《中国小说史略》以至整个鲁迅的学术活动做出了高度评价,但郑文毕竟囿于小说史研究的范围,而长之先生的《文学史家的鲁迅》不仅评论了《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而且对鲁迅所有文学史著作,包括“一些文学史的准备工作——资料搜集,以及散见的文学史见解等”都进行了全面的综述和评价,尤其是从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和文学史的方法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那也是长之先生在研究中国文学史中所注意的问题,且是他治学研究的特点和擅长。

研究鲁迅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来进行,但从文学史的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则非沉潜深濡于其中,对文学史的对象研究颇有心得,则难于着手。正像青梅煮酒论英雄,其所论者是英雄,而论者其人亦非英雄不可。假如我们联系到长之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国学的功底,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韩愈》、《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等专著,而特别是此时他的《中国文学史略稿》(1—3卷)已经问世,正在撰写元明清部分,那么,我们对《文学史家的鲁迅》下面所列的标题:“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解决的文学方法论问题之一——注重作家还是注重时代,注重体系还是注重历史顺序”、“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解决的文学史方法论问题之二——关于全面和重点相结合”、“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略古详近的原则之体现”、“鲁迅文学史著作中之艺术分

析”，乃至对像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体例，“鲁迅文学史著作中所列的参考书”、“鲁迅关于文学史的资料工作”都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探讨，就会明白，此文不单是对鲁迅文学史作品研究得深细，而且是作者在共同的研究对象上于心戚戚焉、惺惺惜惺惺，是有共同的研究甘苦和感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家的鲁迅》不仅以同道的身份评价了鲁迅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崇高的学术成就，而且以鲁迅的研究实践回答了当时学术界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在中国文学史的撰写上感到困惑的问题。

历史的研究是为现实的实践服务的，鲁迅的研究亦不例外。用鲁迅的研究来指导和启示现实的学术研究，可以认为，长之先生的《文学史家的鲁迅》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五、批评家理论的严肃和人格尊严

在长之先生的鲁迅研究中，1935年《鲁迅批判》撰写的前后，和1956年《文学史家的鲁迅》撰写的前后分别形成了两个高潮。^①这两个高潮差别是很大的：前者是在德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指导下对鲁迅的研究，不乏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缺陷；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对鲁迅的研究，也留有苏联文艺哲学中教条主义的影响的遗憾。前者是长之先生青年时代的作品，浪漫狂飚，富于冲击力，而有清浅率意的一面；后者是长之先生中年之后的作品，不仅思想成熟，学力深厚，而且文字更纯净明晰，仿佛岁月删汰了他过多的热情而走向理智。

然而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评论又有着一贯而独特的品格。

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对他的研究是多维度的，多侧面的。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虽然视角颇为丰富，而聚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文学批评上。

长之先生由于在清华读书时先是学生物，后来学哲学，尤醉心于德国古典哲学，受康德、温克尔曼、宏保耳特影响颇深，解放初期又刻苦学

^① 据长之先生的二女儿李书回忆，长之先生在50年代已有重写《鲁迅批判》的打算，1956年也列好新的鲁迅研究专著的撰写提纲，像他的《鲁迅批判》陆续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一样，此时陆续发表的《鲁迅的文艺批评》、《鲁迅美学思想初探》、《文学史家的鲁迅》也正是这新的专著的一部分。可惜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的开始，李长之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权利，研究工作中途搁浅。“文革”中抄家，散乱的文稿也毁损殆尽。

习苏联文艺理论,担任过北京市文联文艺理论组长,因此他对鲁迅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理论思辨色彩。他善于从总体上,体系上去研究把握对象,并把这种感觉传递给读者;他不屑于考据,也缺乏细腻分析体味的能力,却能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把握研究的主题。他的研究往往体现了一个时期研究鲁迅的热门话题,体现了一个时期研究鲁迅的主导流向。由于长之先生同时又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学者,因此他的论文在文字表达上,即使不是全部可以当做好文章来读,至少像《鲁迅批判》,像《文学史家的鲁迅》,是把浪漫文采的表达和学者深厚的功力统一在一种理性的、明晰表述中而独具魅力。

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尤其具有批评理论的严肃性,并表现了一个批评家的人格尊严。批评家之批评精神在其追求真理,在其批评的客观、公正,在其尺度面前人人平等。其本质是独立的,反奴性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应顾及到批评对象是什么人,是什么作品。长之先生对鲁迅的研究正是如此。他在《鲁迅美学思想初探》中认为:“如果说鲁迅的美学思想业已是十分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他还没有触及美学问题的全部,例如悲剧性、喜剧性问题,他就没谈到过;就是他触及到的问题,有的也还不够完全,例如典型问题中的创作过程;普遍性是注意到了,而典型问题中的个性化,就没有谈到。因此,我们只可能谈鲁迅的美学思想,但还不能谈鲁迅的美学体系,如果体系是要求像一本教科书那样匀称的话。”他在《文学史家的鲁迅》中单列一节叙“鲁迅文学史著作中的缺点”,指出“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工作条件的限制,鲁迅的文学史著作也还有未能尽美尽善的地方”,一口气举出了五条。

改革开放以来,长之先生和他的鲁迅研究被重新提起,渐渐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但由于资料的原因,大都囿于《鲁迅批判》的讨论。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伍绍东先生,在阅读了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长之文集》之后,提出有必要将《鲁迅批判》和长之先生的其他鲁迅研究论文汇集在一起出版,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纠正正在评价长之先生对于鲁迅研究时以偏概全,缺乏发展的观点,也可以使得更多的读者方便而集中地阅读上个世纪中鲁迅研究有特色的专家的全部论文。我们感谢并接受他的提议,相信长之先生地下有知,对于研究鲁迅专著和论文的汇集出版也会首肯而颇感欣慰。